

XINXIANSI

新现实

——走向21世纪

[美] 彼得·德鲁克 著

刘靖华 等译

江时学 校译



中国经济出版社

新 现 实

——走向 21 世纪

作者：〔美〕彼得·德鲁克

译者：刘靖华 郭 序

周晓慧 杨 光

校译：江时学

中国经济出版社

(京)新登字 079 号

新现实——走向 21 世纪

作者:[美]彼得·德鲁克

译者:刘靖华、郭序、周晓慧、杨光

校译:江时学

*

中国经济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百万庄北街 3 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朝阳北苑印刷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 7 印张 183 千字

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3001 4500

ISBN 7-5017-2392-3/F·1642

THE NEW REALITIES

Copyright © 1989, Peter F. Drucker. Translated and published with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All rights reserved.

版 权 声 明

《新现实——走向 21 世纪》中国版权属中国经济出版社所有。书中如实保留了原著者的观点和用词,未加改动。

前 言

本书不是一本关于“将要发生的事情”的著作，也不是一本关于“下一个世纪”的著作，其主题是“下一个世纪”早已到来；的确，我们现在已进入了下一个世纪。我们不知道答案，但我们知道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的行动方向清晰可辨。那些受人欢迎、但毫无益处或起反作用的行动方向是一目了然的。现实不同于政治家、经济学家、学者、商人和工会领袖仍然关注的、仍然在著书立说的和仍然在高谈阔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令人信服的证据就是对空想的深刻认识；这一认识是当今大部分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特征。因此，尽管本书不是关于“未来主义”的，但是，它试图指出那些构成未来现实的忧虑、问题和争论。

我们面临的一些最棘手的问题是那些由过去成功造成的问题，例如，福利国家取得了成功；本世纪发明了财政国家；知识社会取得了成功。有效性面临的一些最大的障碍乃是那些口号、承诺和昨天的问题；这些仍然统摄着公开的演说，仍然限制着我们的视野。过去的一些几乎被人遗忘的教训再次变得与现实息息相关了。例如，19 世纪的奥匈帝国和英国在印度的经历及其经济发展对民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影响、对苏俄帝国的未来来说是意味深长的。这一切说明了为什么本书包括大量的历史知识。

这是一本具有雄心壮志的著作，它囊括了众多的领域。本书是一个美国人在美国写的，但本书没有将自身的内容仅仅局限在美国的主题上。本书同样十分全面地讨论了日本、西欧、俄国和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社会和经济。但是，本书也许还有不够大胆的缺陷。技术对军备和防御的影响，对政府的功能和局限的影响以及对学校和知识的影响曾被一次又一次地讨论，但实质上，没有一章是专门讨论技术本身的。我觉得，这个课题在许多著作中得到了充分的讨论。尽管技术十分重要，但它不再是“新东西”了。

■

目 录

前 言

第一部分	政治现实	1
第一章	分野	3
第二章	不再通过社会途径以救世	9
第三章	罗斯福美国的终结	16
第四章	苏俄帝国的衰亡	23
第五章	军备已成为一种反作用力	36
第二部分	政府和政治过程	47
第六章	政府的局限性	49
第七章	新多元主义	63
第八章	“提防克里斯玛”:对政治领导 人的要求发生了变化	87
第三部分	经济、生态与经济学	93
第九章	跨国经济与跨国生态	95
第十章	经济发展的悖论	114
第十一章	处在十字路口的经济学	127

第四部分 新知识社会	139
第十二章 后商业社会	141
第十三章 两种反主流文化	152
第十四章 以信息为基础的组织	168
第十五章 作为一种社会功能与 人文艺术的管理	179
第十六章 变化中的知识基础	188
结论	205
从分析到感知:新的世界观	207

第一部分

政 治 现 实

第一章 分野

即便是在极其平坦的地形中，也有许多关隘。道路在这里先是攀沿而至山顶，而后向下延伸以达新的谷底。大多数这样的关隘仅与地形有关，因此两边的气候、语言或文化的差异性很小，或毫无差异。可是，有些关隘的作用则截然不同。它们是真正的分界线。它们往往既不显眼，亦不壮观。布伦纳尔在穿越阿尔卑斯山的关隘中是海拔最低、也是最容易穿行的一道关隘；但在很久以前就成为地中海文化和北欧文化的分野。纽约市以西大约 70 英里处的特拉华水峡甚至算不上是一道真正的关隘，可是，它却成为东部沿海地区和中部美洲的分水岭。

历史上也存在着这种分界线。它们也并不显眼，当时极少为人们所关注。然而，一旦越过了这些分界线，那么，社会和政治情景便改观了。社会和政治的气候发生了改变，社会的和政治的语言也会产生变异。这就是新的现实。

在 1965~1973 年这段时期里，我们通过了这样一条分界线，跨进了“下一个世界”。我们跨越了在一、二个世纪里为政治定型的那些信仰、承诺和联盟。我们处在政治的未知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几乎没有熟悉的路标。除了少数斯大林分子外，没有人再会相信经由社会途径以救世了——自从 18 世纪启蒙运动以来，这种信仰一直是居支配地位的力量，并且是主要的政治动因。但是，一种有效的政治反作用力也同样地失去了它的效能：这就是利益集团内部的以及通过利益集团实现的政治整合。这是美国对这种政治和艺术实践的独家贡献，马克·汉纳在 19 世纪末期首次倡导这种政治整合，40 年以后，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新政期间使之完善。

最后一个殖民帝国俄国，也已进入了非殖民化的最后阶段。无论以后事情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它大概再也成不了“俄国”或

“帝国”了。

在 300 年或者更长的时间里，武装力量是“生产性的要素”，并且作为政策的一种工具发挥着作用。现在，它们却成为“非生产性的要素”：它们即使不是使经济陷于瘫痪的力量，亦可算是一种经济消耗力量；它们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是不可靠的；而且，它们已经发生了极其重要的和出乎意料的变化——在军事上也没有多大作了。

以上这些都是在本书的第一部分中将要论述的主要现实。

1873~1973 年

跨越上一个“分界线”的时间恰好在一个世纪前，即 1873 年。那一年维也纳股票市场的倒闭所产生的经济影响是有限的，它仅仅使法兰克福、伦敦、巴黎和纽约的股票市场出现了暂时的恐慌。18 个月以后，整个西方世界的经济便完全恢复了。

但是，在政治上，这次对已经十分不景气的股票交易的冲击，标志着自由时代的终结。在此前的 100 年内，自由放任是主要的政治信条。这个时代始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问世的 1776 年。在 1873 年后的 10 年间，曾在“进步”和“启蒙”的旗帜下遍及西方世界的那些伟大的自由党派陷于四分五裂的境地。它们再也没有重新复兴。

在欧洲大陆，那些自由党人几乎立即分裂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反犹太人的社会主义者。这两派均是反对资本主义的，都对自由市场和“资产阶级的民主”满怀敌意。反犹太主义求助的对象是传统的反资本主义者，如农民和小商人，而不是“后资本主义的”产业工人。它象马克思主义一样，也反对放任自流和资产阶级的社会风尚。象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一样，它从一开始就被公开标榜为政治整合的动力和控摄政治权力的组织原则。事实上，将社会主义的方案付诸实施，并且没收煤气公司、电力公司和有轨电车公司的第一位政治家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一位反对

犹太人的社会主义者：他就是 1887 年被选为维也纳市市长的卡尔·卢埃格。就象大约 50 年后约瑟夫·斯大林所表明的那样，马克思主义和反犹太主义是能够被轻而易举地合二为一的。当然，在生命的最后岁月中，斯大林的神智已不十分清醒了。可是，斯大林在 40 年代后期发起的反犹太人的运动并非仅仅是他的偏执狂所致。作为一个精明的政治家，他无疑已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信仰是失败的，因此，他采用了反犹太人这个替代方案，以便使奄奄一息的社会主义和陷于瘫痪的共产党恢复活力。

在其萌芽时期，即从 19 世纪 80 年代起，马克思主义者和反犹太人的“国家”社会主义就并驾齐驱，竞相争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继承权。在 1873 年股票市场崩溃之前，维克托—阿德勒和格奥尔格·冯·舍纳尔这两位年轻人就已经成为奥地利自由主义的两颗崛起的新星；两人结成同盟，成为挚友。5 年以后，他们又反目为仇。阿德勒成为欧洲大陆的一名最受人尊敬的马克思主义领袖，而舍纳尔则缔造了第一个反犹太人的政党。60 年以后，阿道夫·希特勒将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维也纳流浪岁月中从舍纳尔那里学到的一切在德国付诸了实践。

在 1873 年以前，卡尔·马克思是一位性格沉郁而“古怪的人”。他以给报纸撰稿为生，维持着捉襟见肘的生活。5 年以后，他成了一名在整个欧洲，甚至在美洲都拥有大批信徒的大学者。在 1873 年以后的 20 多年里，在欧洲大陆的每一个主要国家中，如法国和意大利，德国和奥地利，甚至在官方实行镇压措施的沙皇俄国，信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结成了他们国内唯一的最大的政党。

在维也纳股票市场崩溃 10 年以后，即在 1883~1888 年这段时间里，德国首相俾斯麦发明了国民健康保险和老年义务保险。这一切导致了由政府提供社会保障安全网的“福利国家”的产生。同一时期，英国和奥地利开始通过检查工厂、制定健康和安全规则，以及禁止雇佣童工和妇女等措施来缩小工厂主的权力。甚至在远离欧洲政治潮流的美国，19 世纪 80 年代也发生了变化。由于实施

了格兰杰法，成立了管理铁路的州际商业委员会，通过了反托拉斯法以及管理和限制证券业的第一批州法律，市场放任自流的状态得到了改变。在 19 世纪 80 年代后期，也是在美国，出现了第一次非同寻常的“反企业”政治运动：民众主义。它要求政府控制华尔街，管制农产品价格和控制工作时间及工资。在 1900 年前后，在民众主义者的领导下，内布拉斯加州的首府林肯市成为对当地的动力公司、煤气公司和有轨电车公司进行“社会化”的第二个城市——第一个城市是数年前的维也纳。

到 90 年代中期为止，反犹太主义也已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1894 年，法国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队长犯了间谍罪。审判德雷福斯的事件引发了一场反犹太主义的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亲纳粹的维希政府直接继承了这场反犹太主义浪潮的衣钵。1895 年，德国皇帝宫廷传道士阿道夫·施特克尔在柏林组建了一个社会主义者和反犹太人的政党，试图公开地把这个国家中的“反资本主义分子”动员起来。

如前所述，一年之后，奥地利人把第一位反犹太主义者选上维也纳市市长这个高级政治职位。

德雷福斯事件后，极权主义的羽翼日趋丰满。在德雷福斯被错误地指控为受德国雇佣的间谍的 2 年后，法国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是无辜的。实际上，在那时，谁是真正的间谍已成为一个公开的秘密。然而，要求为德雷福斯恢复名誉的呼声得到的回应却是：“谁关心他是否清白无辜？军队的利益才是重要的”。极权主义的实质就在于它主张集体、政党、国家和雅利安民族的利益至高无上。极权主义主张军队的利益是“真理”，是至高无上的准则。这一主张使法兰西的舆论对德雷福斯群起而攻之。10 年以后，德雷福斯的名誉得到恢复。但在那时，列宁已为“真理”下了定义，即“真理”是帮助、加强和发展“政党”的事物。这一定义是后来他本人的、墨索里尼的、希特勒的和毛的极权主义政权建立的基础。

在 1873 年维也纳股票市场倒闭以后的 100 年间，政府对经济

的控制和政府对社会的指导都是“进步”的事业。重大的政治辩论不是围绕福利国家而展开的，而是在这样两种人之间展开的：第一种人是：“福利国家”的信徒，在“福利国家”里，政府受到民主和法律的制约，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也有民主和法律的制约；另一种人是极权主义的信徒，它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派别，这些人是绝对的、无限制的政府权力的鼓吹者和实践者。

1973 年的分野

在经济上，1973 年的“石油冲击”和 2 年前尼克松总统让美元“浮动”的决定同样可以被视作无关紧要的事件。对于仅仅注意诸如国民生产总值、经济增长率、外贸统计资料等数据的统计学家来说，他们看不到除了那些直接的、短期的和在统计上意义不大的波动以外的其他影响。同样，如果人们仅仅注意各种机构是怎样运转的，那么，60 年代末在日本、法国、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发生的那些严重的、震撼世界的、报纸以头版头条刊载的学生骚乱事件也应被看作是无关紧要的事件。这些事件对下述机构——政府、大学和社会整体——中任何一个的行为都没有产生出丝毫的影响。

但是，1968～1973 年这段时期是一个与 1873 年完全类似的分水岭。1873 年是自由时代的终结，1973 年则标志着政府是“进步”事业的时代结束了。它使这样一个时代寿终正寝，在这个时代中，居于支配地位的是起源于 19 世纪 70 年代的自由民主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学说和政策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或民族社会主义者的学说和政策。如同 1873 年以后的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那样，所有这些学说正在迅速地衰微。

政治口号比政治现实更有生命力。它们是洋溢在政治笑面虎脸上的微笑。1850 年的政治口号表达了酷爱自由的一代伟人的政治信仰。这一代人是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艾伯特亲王、约翰·斯

图尔特·米尔以及1848年欧洲大陆上的革命者。这些口号依然是当代的新保守主义者的共同用语，虽然两者之间有一些微小的变化。“福利国家”世纪中流行的口号还将长时间地伴随着我们。但是，正象自由主义者到1900年时已和政治没有多大关联性一样——尽管，人们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仍能见到他们的身影、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而且极其尊敬他们——福利国家的口号或共产主义的口号所反映出的政治学说在政治上、社会上、甚至在经济上也不再有很多的关联性或现实性。政治口号依然被用来作为行为的制动器，但是，它们却大概再也不能指导行动或者为行动提供推动力了。

新政时期的口号也许还将为美国以后的选举提供激动人心的政治辞藻。但是，如同过去几次总统选举运动所表明的那样，它们难以做到的是吸引足够多的选票，因而不能赢得选举的胜利，更谈不上在上台以后提供什么指导了。它们仅仅是政治笑面虎脸上的微笑而已——除了兽性之外则一无所有。

第二章 不再通过社会 途径以救世

“只要共产党的权力垄断不受到威胁，这就是社会主义。”这是苏联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宣扬的新的“党的路线”。这不是西方报界所称的一种新的实用主义，而是一种赤裸裸的权力思想（并且是十分陈腐的思想）。它完全放弃了任何类型的共产主义——或者任何类型的社会主义——所代表的一切。如同罗马教皇宣称的那样，只要天主教徒继续向罗马奉献年金，就不必去介意他们是否信仰基督。

这种政策厚颜无耻地放弃了能够使卡尔·马克思将他的学说称为科学社会主义的那种根本观点：即设想了一个能实现社会和个人的尽善尽美的永远存在的社会，一个建立了现世乐园的社会。正是这种对经由社会途径以救世的学说的信仰，才使马克思主义获得了惊人的号召力。但是，除了一小撮已被淘汰的政党的御用文人以外，没有人会对戈尔巴乔夫的权力思想感到吃惊。其他人——尤其是在共产党国家——早已不再相信所谓的经由社会途径以救世了。他们不再是实用主义者，而是玩世不恭的人。

俄国的戈尔巴乔夫先生以及中国的邓先生和他的继承者，可以成功地保持他们的党的权力垄断，或者甚至可以恢复国内的经济活力。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他们无法做到的，那就是恢复这样一种信念：即通过共产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来实现社会的拯救。这种信念已经永远地消失了。即使在非共产党国家里，通过社会以救世的信念同样不复存在了。除了南美洲的“解放神学家”以外，也许没有人再会相信通过社会行动，人们就可以创造一个尽善尽美的社会，或者甚至把社会推进到这样一种理想状态，或是使个人发生根本的变化，以便创造出一个“新亚当”。

50年前，这些信念都是司空见惯的。无论是社会主义者，还是世界上大多数政治思想家，他们都认为社会行动——尤其是消除私有财产——将从根本上改变人类。持此信念的人是社会主义的信仰者，纳粹党人，共产主义分子等等。他们之间的差异不在于基本的信条本身，而在于社会发展的速度，在于采取何种最具有建设性的行动。他们之间的主要争论在于采取什么手段。消除通往完美社会道路上的障碍是政治和政府的作用吗？——这种作用在今天被称作“新保守主义”，而在60年前，则被称作“自由主义”，或者政府应该积极创造新的制度和新的条件吗？现在这一场争论都已随风逝去了。

政府是不会“衰败”的，也不存在这方面的任何迹象。可是，现在的任何一个人要是公开赞扬那种“伟大社会”，就象林登·贝恩斯·约翰逊在20年前所做的那样，他就只能受到人们的嘲笑。我们争论的是具体措施。我们所要问的是政府应该支持这种行为，还是禁止那种行为。人们将根据每一项政策实施的得失之比率来评估它们。政策成功的可能性也会引起争议：禁止使用使人上瘾的麻醉药品与允许其合法化相比，哪一种方法更能制止麻醉毒品的泛滥呢？哪一项措施能够吸引选票，能维持一个政党的执政地位或能把执政党赶下台呢？

当然，仍然有人——也许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会把他们自己称作“社会主义者”或“工人”。但是，这一称号的含义已由1981年上台的法国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加以说明。在密特朗上台时，他是欧洲最后一个真正献身于社会民主主义的人，成为30年代的方案、理想和抱负的继承者。密特朗上台180天后，法国的资本外逃这一现实迫使他改变了方针。几乎在一夜之间密特朗的社会主义政府就变成了西方世界中最为亲资本主义的政府了。自1982年以来，在密特朗的法国，社会主义意味着要把执政党的拥护者和支持者选作国有化工业部门的高级行政官员。今天，在法国，能够强化社会党政权的一切都可以称作社会主义。我们可以把这一切与早在50年前，即1931年发生的事情作一对比。那时，英